

故乡巨变

□胡焕亮

袅袅升腾的炊烟,萦绕在一座座冒着热气的草房的上空;做好了晚饭的农妇,亮开嗓门呼唤玩野了的孩子回家吃饭,那喊声随着氤氲的暮霭,流动于七拐八弯的巷道,传遍村子的每一个角落;暮归的老牛,悠闲地甩动着尾巴,跟着主人不紧不慢的脚步,沉稳地走进牛棚;几只大狗带着小狗,互相追逐,蹦蹦跳跳在房前屋后;散放的老母猪领着一群小猪,用它们厚厚的嘴唇,拱完了这个粪堆,又转移到另一个碎草窝,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它们感兴趣的“食物”……这就是深深植根于我记忆底层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村庄。

年前,我回到阔别了40年的故乡——现在的凤台经济开发区;却怎么也找不到记忆中的村庄了!那再熟悉不过的村前污水沟、静静矗立着我和小伙伴们嬉闹声的大柳树;引得人直流口水的弯枣树、还有那高高挑着红灯笼的柿子树,以及山上裹挟着浓烟、震耳欲聋的开山放炮声、尘土飞扬的穿境沙石公路……一下都没了踪影。

过了淮河大桥,踏上开发区的土地,顿觉一股清新、昂扬之气扑面而来。宽敞、笔直的公路两旁,高耸的标语牌醒目地散发着开发区日新月异、突飞猛进的气息;规划如一的景观树、绿化带在明媚的阳光下,跃动着鲜活葱绿的朝气;成群的楼盘、井然有序的生活小区、人头攒动的市场,到处都在彰显着开发区人昂扬向上、和谐安宁的精神风貌。

一条条平整笔直“村村通”水泥

路,就像光滑柔韧的缎带,把一座座新颖别致的小区串联起来,宛如镶嵌在开发区土地上的一粒粒明珠;现代化的工业园区,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淮凤公路两侧,紧张而有序,忙碌而井然。

我清楚地记得:以前,从我居住的地方,前往我的出生地,必须经过淮河渡口。上一班渡船与下一班,至少会间隔半个多小时,有时遇上特殊情况,会等上一个多小时,有急事要办理,你也没有办法。现在好了,凤台淮河大桥、淮河二桥、李孔大桥相距仅几公里。从哪里过淮河都很方便。那时候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,中间总会有大片的开阔地或者水塘为自然界限,每到夜幕降临,到处漆黑一片,胆子小的还真不敢独自穿行。可现在,村与村、庄与庄早已连接得“天衣无缝”,再按传统的姓氏或者自然村划分,那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,真可谓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。现在夜晚出行,根本不用担心看不清道路,不要说公路两侧那五彩斑斓的路灯已经把夜空照得恍如白昼,就连自然村里的主干道也是灯火通明,广场舞随处可见,那些大嫂、大婶们晚饭后,总会到这里纵情载歌载舞,甚至到了深夜还会有人那里打牌、下棋或者闲聊。

靠近十字路口红绿灯北侧,是以前老公路经过的地方,现在开辟成一个十分繁华的集贸市场,大到电器百货、建筑器材,小到儿童玩具、日用百货一应俱全;街道两边的货摊上,瓜果蔬菜、鸡肉肉蛋、时鲜珍馐应有尽有。大功率的音响,播放着流行音乐在招揽顾客,商贩们的叫卖声,此起彼伏;前往购物的男男女女,络绎不



杨志作品

绝。见此情形,不禁想起40多年前的

一件事来。那时候我还是大队的一个青年团干部,平时那些跑腿费力的事总少不了我。一天大队来了客人,书记派我去买菜买酒,中午要招待来人。置办这些东西有两个去处可选择:一是凤台县县城,二是去淮南的孔集集贸市场。到县城近一些,但要乘船过河,耽误时间;到孔集远一些,但是骑自行车单程最多要不了半个小时。俗话说“隔水不近”,我还是选择了骑自行车去孔集。结果加上来回所用时间、排队买酒买菜(计划经济年代,几乎买什么都要排队凭票),直到晌午我才回到大队部,差点儿耽误他们做菜做饭。

来开发区之前我电话联系了堂弟,中午,到他家用餐。要不是电话里说清楚了,我还真找不到他的家了呢。他已经于去年住进了安置新区。来到他家楼前,门前并排停放着两辆

崭新的轿车,代替了我司空见惯的锈迹斑斑的手扶拖拉机。那是他在市里工作的弟弟和自办企业的儿子的私家车。看着统一规划、设计新潮的小区住房,平整宽敞的水泥大院,我不禁询问:“你打场、犁地用的拖拉机呢?”堂弟笑着说:“那东西早没有了,现在收割、播种都用大型收割机或播种机了,谁家还用拖拉机啊?”

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看着眼前的一切,岂能不心生感慨。我们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先人,恐怕做梦也难想到,他们的后代居然能赶上这样的好时代、好光景。

席间,堂弟夫妇俩不无骄傲地宣布:开发区领导说了,三年内让那些旧村庄、旧建筑、旧街道彻底消失;我们家东侧的那条街道,将建成“民族风情一条街”,用来安置教民巷的少数民族兄弟;对面的小山上,将会开辟成一个集休闲、娱乐、医疗等多种功能的场所。那时候,我们的幸福指数会大大提升。

老家的街灯

□牟伦祥

春节期间回到离别两年多的老家,突然发现曾经黑灯瞎火的场镇变得灯火通明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老家场镇如此绚丽的灯光。兴奋之余,陡然想起郭沫若《天上的街市》里面的诗句:“远远的街灯明了,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。天上的明星现了,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……”对于老家的街灯,我骨子里饱含着一种特殊的情感。

我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在重庆东部的一个偏远山村,离老家一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乡场。所谓“场”,也就是由公社(现在的乡政府)、供销社、食品站、粮店、卫生院、邮政所等总共二三十间房屋组成,从这头到那头,叼一支烟可以走好几遍,场小,从不赶集。

因离家近,我一年四季经常到场上玩耍。印象最深刻的是,那里用于照明的灯比农村高级得多。那时农村穷,一到夜晚,家家户户用葵花杆或松油亮子照明,点不了多久就熄灭了,多数时间村民只能在黑黢黢的环境里干家务。而那时,场上全部点的是煤油灯,虽说如豆的灯光昏暗、黑烟直冒,但总还有那么一线光亮,给人们黑夜里一种指引。后来,场上的单位和条件好的住户,又很快使用有玻璃罩的马灯,晚上看电影或开社员大会,他们提着马灯来去自如,既防风避雨,又明亮许多,夜幕中那一束束晃动的亮光,感觉黑夜不黑,真是好。

场上的灯最让我羡慕的是用上电灯之后。1978年,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,邻村群众大干快上,修建了一座小型水电站,作为全乡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乡场,理所当然率先用上了电灯。通电那天,鼓乐喧天,热闹非凡,乡民从四面八方赶来稀奇。在他们心中,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的理想正在实现,个个兴高采烈。我穿行在人群中,从这间房跑进那间屋,围绕15瓦的白炽灯反复端详,想弄清为什么它在风中摇曳而不熄灭?我还看见,一位抽叶烟的老者,拿出长长的烟杆欲从电灯那里点火吸烟,结果闹出了笑话。

由于河水不丰,电站是清晨和晚上才发电,且电压不高、不稳。后来,用户增多,大家争着将灯泡由15瓦换成100瓦,恶性循环,灯里钨丝仍只是红红的,不甚明亮。远处望去,电灯就像一朵倒吊着的南瓜花,人们戏称“南瓜花”电灯。尽管如此,在那个年月,乡亲们还是为场上有电灯而感到骄傲万分。

1984年,我以农民儿子的身份考上了招聘乡干部,在乡政府工作期间目睹了乡场的变化。经历几年改革开放的农民,开始到场上摆摊设点、买进卖出,寻求发展商机。一时间,狭窄的街道两旁搭建起不少木板房和竹篾房,商店、小食店、理发店、加工店如雨后春笋。随着乡场的繁荣,人们对电的需求越来越大,对“南瓜花”越来越不满意,要求拉入国家电网的呼声日高。

勘测、立杆、拉线,不到半月,国家电网的电穿越千山万水,历经长途跋涉,终于到达了老家乡场。从此以后,场上开始安装日光灯。日光灯与白炽灯比起来,亮度简直是两重天,人们在柔和而通明的灯光下读报纸、甩扑克、下象棋,随意而为,脸上笑逐颜开。

乡场变化之快,让人始料未及,但最大的变化,要数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。附近农民先前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逐渐被摒弃,试着把葱、蒜苗、蔬菜等拿到场上出售。乡政府顺应民意,号召乡民赶集,就近交易,搞活流通。经过精心筹备,1988年冬,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,老家乡场破天荒地开始了第一次赶集。不久,场上红火起来。一遇赶集天,人流摩肩接踵,人声喧哗,煞是热闹。可是没过两年,随着经济突飞猛进的快速发展,特别是柑橘、柠檬基地的建成,外地商贾云集,车辆往返,小场显得拥挤不堪。

1991年,政府征地扩建,一座崭新的场镇拔地而起。宽阔笔直的街道、高大挺拔的行道树、整齐划一的楼房……无不显示出场镇的气派和前卫。我每次回老家都要穿越场镇而过,行走在街道上,心情愉悦,神清气爽,心里别提有多高兴,我为家乡的变化而倍感自豪。但美中不足的是,场上没有安装路灯,一到晚上,黑灯瞎火,死气沉沉。

居民对路灯的盼望与日俱增,但由于这笔安装费价格不菲,乡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恰在此时,政府实行乡镇合并,老家所在的乡被并入另一个镇,公共事业经费投资受限,鞭长莫及,街道两旁路灯安装一直悬而未决。但小小街灯并未阻碍场上商贸的发展,特别是近几年,老家柠檬已出口国外,从秋到冬,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果农挑着金灿灿的柠檬到场上出售,从他们笑盈盈的目光里品尝到了幸福的滋味。前两年,当地政府在场地上安装了超前的太阳能路灯,夜晚如同白昼。每当黑夜降临,广场上彩灯闪烁,不少中老年人翩翩起舞。老家的街灯亮了,一幅美丽的山村夜景图展现在人们眼前。

从煤油灯到“南瓜花”电灯,从日光灯再到太阳能街灯,那些带给我们意味深远的的光芒,快乐而充实,让我见证了—个时代的伟大巨变。



路,不再遥远

□孙明舜

接到关外三姨打来的电话,我感到很突然,由于关山的阻隔、路途的遥远,自从大姨和姨夫去世后,我和姨哥家已经有好长时间没通音信了。

大姨家住在河北丰宁的胡麻营乡,我家在北京的密云,在地理上,我们管古北口外和白马关外统称关外。在我幼小的记忆中,大人们描述的关外遥远而寒冷,地广人稀,是旧社会人们逃荒的落脚之地,我的大姨就是解放前姥爷逃荒时留在当地给人家当童养媳的。

解放前由于不通公路,姥爷告诉我,他去一趟大姨家,带上干粮,背上铺盖,路上还要借住两宿,翻山越岭得走上4天,两头不见太阳,那辛苦劲就别提了,但姥爷思女心切,总觉得大姨一个人在关外孤孤单单,所以每年必须得去上一次。

这样步行的探亲路一直走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,1979年,白马关通往关外的土路修通了,但不通公交车,姥爷也老了,走不动了,看望大姨的任务就落到我们几个外甥和舅舅头上了。第一次随舅舅去看大姨,是从村里小学老师家和大队书记家借的自行车,我和舅舅早晨天没亮就出发了,带着干粮和水,骑到半路我就骑不动了,没办法,只好骑一阵,走一阵,到了大姨家,已是凌晨4点多了,真是又困又乏,歇了两天,才缓过劲儿来。那时我就想,什么时候大姨家能通公交车就好了。

1985年,我高中毕业了,从我们村路过的京通铁路通车了,我们村头还设了一个站,大姨夫来信说,我们可以坐火车到半路的虎什哈站下车,再倒公交车就到他们村了,听到这个消息,我高兴得不得了,心想,再也不用骑自行车受那份罪了。

暑假在等待录取通知的时候,接到姨夫的来信,说大姨病了,很想我们。这次又是我和舅舅同去,我们上午10点从村口的车站上车,下午4点多就到了,虽然提着大包小包中途下车有些麻烦,但比过去骑自行车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1996年,开通了从天津蓟县过古北口到河北丰宁的公交车,这样我们去大姨家就可以直达了,过年大姨家宰了猪,让姨哥给我家送鲜肉来,4个多小时就到了。母亲感慨地说:“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啊!”

随着交通的发达,车越来越多了,由过去的定点到不定点,随走随有,而我们彼此往来带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,因为我们这儿有的大姨家也有。

2003年,大姨走完了她幸福的晚年,临终前,她对我们这些赶过去的娘家人说,她知足了,一个旧社会没吃没喝逃荒要饭的童养媳,到今天儿孙满堂,吃啥有啥,是碰上了一个好社会呀。

大姨和姨夫相继去世后,我们由于忙于个人的生计,彼此的联系相对就少了些,节日的时候和姨哥打个电话彼此问候一下,电话那头的他总是不忙,因为姨哥开了一家工厂,国内外订单不断,他一年四季没有闲着的时候。没想到眨眼间,他的儿子都要结婚了。姨哥说他要派车来接我们,我连忙谢绝了,告诉他,我也买了车,我们一家和舅舅家都开自己的私家车去。

我们抄近路沿着当年骑自行车的路线,出了白马关的路还是那条路,但比过去更宽了,土路也变成了柏油路,车走在上面非常平稳,过去骑自行车走了多年,也不知道这条路到底有多远,这回我们都打了里程表,两个小时就到姨哥家了,整整120公里,舅舅感慨地说:“原来120公里呀。”

就是这区区的120公里,自驾车两个小时的车程,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却成了我和大姨家之间的“天涯”,而今天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和交通工具的改善,使我们的探亲路不再遥远,天涯变成了咫尺。

波澜壮阔40年,昂扬奋进新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征文

征文投稿邮箱:cnwriter@163.com



澳大利亚水彩画家约瑟夫·布罗克维克作品

一个农村放映队员的三次经历

□高山玉泉

我的家乡在山区,这是一个风景优美、民风朴实的村庄。全村只有50余户农家,近200来人口。加上周边几个更小的村子,也不过300余人。当年为了让山区乡亲们看上电影,我被选为农村电影队放映员。

那些年,农村都是露天电影,放映费用由集体承担,村中男女老少都免费观看。我白天要翻山越岭,挑着电影机去放映场地。一到天黑,用水杆架起银幕,多部电影一起放,直到午夜才罢休。我年轻力壮,不怕苦。每当乡亲们欢声笑语迎接我时,心中充满着自豪,再苦再累我也愿意。

影片是由县城电影管理站提供的,要到县城去领。放过后还得把影片送回,让下一个放映点使用。最让我吃尽苦头的是领送影片。山村离县城电影管理站有近40公里路程,如果不能坐上去

县城定班客车,那可够呛了。要知道,当年农民能看上一场免费电影,是他们心中美好的愿望。

那时,山村去县城一天只有上下午两趟来往班车,车次少乘客多,我因带着电影胶卷很难挤得上。其中我的三次经历让我至今难忘。

第一次,我要把放过的影片送回县城。一大早就去班车的站点等候,不久后等车的人越来越多,眼看客车已无法将旅客全都带上。未等班车停稳,大家就争先恐后挤向车门,我有影片胶卷筒背在身上挤不上去。客车顶部有装行李的固定框架,旅客可通过车后小铁梯上车顶,我背着影片筒就从小铁梯上了车顶,顺势伏在行李架上,在车顶上返回县城。当然,事后挨了批评,还被罚了款。

第二次我是领到影片去村里放映。那一天下午,车票已卖完,老天爷又与

我作对,下起了小雨,急得我直冒汗。我悄悄背起电影胶卷筒,跑到前方进山村的路口。客车到那里要进乡村泥道,必须放慢速度。我在路中间等候班车到来。客车驶到我身旁,驾驶员把喇叭鸣得刺耳耳朵,他见我纹丝不动就怒斥:“你不想找死呀!”我急忙道歉:“师傅,师傅,实在对不起,我买不到车票,只好途中拦车。”驾驶员朝我看了一眼:“原来是你。上次挨批,你还不接受教训。”我毫不退让:“师傅,师傅,今天是我县解放18周年,为了庆祝,我必须天黑前将影片送到村里。”驾驶员见雨水从我头顶一直流到脚面,终于点了点头:“为了乡亲们能及时看到电影,我破个例,让你中途上车。”

我的第三个故事,那已是近40年后的事了,那年我退休不久。村里安排吃幸福餐,表示对解放县城这一日的纪

念。村书记对我说:“我们幸福餐后最好能放一场电影,你能否办好?”我拿起手机一看,现在已近下午5点钟,赶快与县城电影管理公司联系。对方同意将最热门电影提供给村民,我开上自己的小车直奔县城。

现在,去县城路上已建成隧道和山间桥梁,原来近40公里绕山泥路,缩短成20公里水泥大道。班车已有招手车代替,每隔十几分钟一班,户户建造了新屋,大家有了私家车,各种车辆川流不息。不到一个半小时我就把放映机、影片及放映员带到村委会新建的文化礼堂。

电影放映前,村书记向大家说:“今天是我县解放68周年的幸福日。大家要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,让家乡建造更上一层楼,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。”

影片开映。在银幕上出现特大片名:开国大典。全场一片欢腾。